

2404

松
桃
文
史
資
料



第二輯

松桃政协



松桃文史资料

第二辑

11t113/36

政协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松桃

松桃文史资料（第二辑）

承办单位：政协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划）

刘汉华 邢炳威 肖继光 宋 新

金 璇 林北辰 贺从宪 张发贵

姚 鹏

封面设计：聂忠邦

校 对：汪乃梁 杨代英

印 刷：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一九八三年一月

目 录

前 言.....	(1)
忆雅沙塘反伏击战.....	张清田口述 松桃政协记录整理 (3)
长兴区解放初新政权建立的回忆片断.....	许志南 (16)
苗族英雄龙世昌.....	贺从宪 (27)
“江防总队”的来龙去脉及其第三大队在松桃的下场.....	代同科 贺从宪 刘鸿域 (32)
罗启疆的一生.....	邓纯如 李昌权 刘鸿域 (43)
黄昌俊烈士.....	滕久祥 杨代英 (63)
松桃新学的倡导人——戴雅澄先生.....	杨代英 (69)
松桃伪政府三十年见闻录	熊开玉 (74)
解放前四十二年松桃历届县长简介.....	杨代英 姚绍基等整理 (86)
松桃解放前后反动派“应变计划”的破灭.....	杨伯雄 (107)
解放前松桃商会内幕	邓纯如 (120)
松桃在辛亥革命中片断.....	张志能 姚绍基 (130)
松桃卫生事业的回顾.....	唐永江 (134)
松桃杨芳等诗、对选.....	编委会搜集整理 (140)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编 者 (149)

前　　言

《松桃文史资料》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出版第一辑之后，我们即着手进行本辑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现在，这本《松桃文史资料》第二辑，终于付梓问世了。

本辑资料内容，多系辛亥革命后至解放初期松桃地方史料。解放前的松桃，兵、匪、官、绅狼狈为奸，残酷地剥削、压榨、抢劫、杀害穷苦人民，松桃人民曾进行过不屈不挠的反抗，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更在松桃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动人事迹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记述革命前辈的战斗经历，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再现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罪恶史，对激励我县人民特别是年青的一代投身四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教材，无疑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

编辑本辑文史资料，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夸大，不缩小的原则，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继本辑资料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征集、编写和出版《松桃文史资料》的以后辑次，计划每年出一辑。我们殷切地希望有关人士积极提供稿件，踊跃来稿，对我们的工作予以鼓励和支持。

本辑资料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铜仁地委、松桃县委的大

大力支持，承各单位、各方面朋友、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松桃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十月

忆雅沙塘反伏击战

张清田 口述

松桃政协记录整理

我每次路过雅沙塘，总要停下来，看看这个三十多年前我和战友们战斗过的地方。在那次战斗中，我们有二十三位战友的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我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有着亲切的感情。环顾昔日的战场，走近曾经是战友们倒下去的地方，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同志们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那种不避艰险，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那种勇猛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一直铭记在我的心头，时时鞭策和激励着我，使我在继承先烈们未竟事业的漫长征途上，未敢稍存懈怠。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这次战斗的，又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担任这场战斗后一阶段的指挥员。这场战斗，由于匪众我寡，力量悬殊，又是在土匪布置好的埋伏圈内进行，所以，打得异常艰苦，令人惊心动魄。

那是一九五〇年六月上旬，贵州省军区文工团在松桃县城进行慰问演出结束后，分乘二辆卡车从松桃县城出发，准备经铜仁回贵阳，中途到盘信停下吃中饭。我当时是盘信区人民政府政委兼武工队队长，有事要去铜仁一趟，征得文工团领队、省军区宣传科徐科长同意，便与区通讯员潘德荣上了车，两车上已有八十余人，除文工团员外，还有一些搭乘便

的当地党政工作人员、驻军的出差干部。所有在车上的同志，我一个也不认识。文工团女同志居多，除有数支道具枪外，没有武器；搭乘便车的人，除我和通讯员潘德荣各有一支短、长枪外，其余都无武器。

省军区文工团经铜仁来松桃时，铜仁军分区派一个步兵班由一个排长率领随车护送。步兵班共十一人，全都携带步枪，行车时，这个班的主力和班、排长都在第一辆车上。

盘信土匪吴克慧、向良、张长仲、龙中文、朱子宾等，侦悉文工团在松桃演出已结束，即将乘车返贵阳，便勾结普觉的大匪首高竹梅，纠集匪徒五百多人，在雅沙塘偏北的尖坡附近设下伏击圈，企图将省文工团的同志消灭。

雅沙塘属盘信区辖地，距盘信十三公里，距铜仁三十二公里，是盘信到铜仁的必经之地。公路两旁都是山坡，山上树林丛丛，附近村寨稀疏。

四九年来，贵州全省都很顺利地解放了，但毗邻的四川省尚未完全解放。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分散在四川各地，企图作最后挣扎。为消灭这些残余势力，早日解放四川，解放贵州的二野五兵团马不停蹄地又全部入川去了。贵州各县、各区乡的政权都仍原封未动，地方反动势力、地主、土匪武装亦未被触及。五〇年元月，由各野战军和老解放区抽调了一部分干部，组成军政工作团分别到各县建立新政权。工作团人员不多，力量薄弱，没有解放军作后盾，工作很难开展。各地反动势力大耍两面派手段，见我们人多势强，就摇旗欢迎；人少势弱，就群起袭击，致使不少同志遭受杀害。当时的松桃，情况也是这样。

五〇年三月初，铜仁专员公署决定：暂撤出酉五县的军

政工作团，把力量集中到东五县开展工作。我原在西五县的印江县，根据专署的决定，便与同县的三十余位同志到了松桃。松桃军政工作团政委魏焕斗同志分配我到盘信区任政治委员，与印江来的三十余位同志编为一个武工队，由我兼任队长，将武工队带到盘信。

盘信是苗族聚居地，是铜松公路的中间站，土匪十分猖獗，曾数度攻占盘信。三月底，当我率领武工队重新占领盘信时，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撤离。我们到来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并在驻军的配合下（当时解放军一三七团一个营驻扎松桃县城），对该区几股主要土匪进行围剿，但都扑了空，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懂苗语，没有群众基础。土匪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窃取我们的军事情报，等我们出击时，他们早已逃跑了。我们曾努力学习苗语，但时间短，收效微，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雅沙塘战斗的发生，正是地方反动势力与土匪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向我军进行的一次疯狂反扑。

我在盘信上第一辆车后，站在紧靠驾驶台棚的车厢内，省军区徐科长和通讯员潘德荣在第二辆车上，两车相距三百公尺。当第一辆车驶近雅沙塘的尖坡附近时，右前方山头上突然出现几个人端着枪辆我们奔下山来。我知道发生情况了，急拍驾驶台顶棚大声说：“停车，有土匪！”不待车停稳，我已跳了下来。几乎是同时，土匪的机枪响了，四面枪声大作，子弹暴雨似地朝我们射来。待车停稳，人都跳下来时，已有五、六人伤亡。情况太突然，下车后，一时找不到掩蔽处和射击位置，有的人紧靠着汽车，有的人躲到车底下，有的就地卧倒。稍过片刻，我们才占领了右侧的一条土坎作为射击位置。

开始还击。双方对射一段时间后，我观察一下战场，发现四周的山头都被土匪占领，人数很多。有的山头距我们不足一百公尺，最远的也只有二、三百公尺。我们完全陷在土匪的包围之中，而且暴露在土匪最密集的火网之内。我们占领了这条土坎，右边山头土匪的火力虽受到一定限制，但左边山头和右前方山头（即尖坡山），土匪的火力仍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特别是右前方那座尖坡山上，土匪布置有一挺轻机枪，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不仅居高临下地控制着战场，而且有效地封锁了我们向铜仁方向突围的通路。我们下车后，几位同志陆续伤亡，就是那个制高点的射击造成的。我想：处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如土匪向我们发起冲击，后果将不堪设想，如固守这样的阵地，无异于等待死亡。指挥我们战斗的是铜仁军分区的那位排长。为扭转被动局面，摆脱险恶困境，排长决定组织一个突击组，袭击并夺取右前方那个制高点。他向步兵班长交代了战斗任务，在土匪密集的枪声中，亲自率领战斗组长（副班长）和两个战士，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向制高点隐蔽前进。我们集中火力向制高点匪阵射击，掩护突击组袭击，并注视着制高点匪阵动静。这时各个山头上土匪仍朝我们射击，似未发现我们的突击组。突然，制高点附近出现了非常激烈的枪声，匪阵骚动起来，我们估计是突击组向土匪开火了。枪声一阵紧似一阵，旋即稀疏下来。不久，突击组两个战士回来了。每人多背回一支枪和一条子弹带——排长和战斗组长牺牲了！原来，当他们刚刚接近制高点的半山腰时，被土匪发觉，土匪集中火力向他们射击，排长只好决定向匪阵强攻。在进攻中，排长和战斗组长先后牺牲。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失去战斗指挥员，对我们精神上

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步兵班长从两个战士手中接过排长和战斗组长遗下的枪弹，转身交给一三七团两个出差的干部，便和另外两个战士一道，向制高点攻击前进。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为了我们的生存，为完成排长他们未完成的任务，为牺牲的烈士报仇去继续袭击匪徒，夺取制高点的。我们默默地祝愿他们胜利，目送他们一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时，土匪仍在继续向我们射击，嗥叫着要我们投降。这个山头嗥叫一阵，那个山头又接着嗥叫，气焰甚为嚣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都集中在班长等三位同志的身上，都焦急地等待着这次袭击的结果。不多久，制高点方向传来一阵对射的枪声，接着又稀疏下来，山头上匪阵中也并未出现较大的动乱。失利的预兆紧压在我们的心头，果然，没过多久，两个战士带着班长遗下的枪弹跑回来了。他们这次只到山麓即被土匪发觉，在一阵对射中，班长牺牲了！

突袭制高点战斗的再次失利，战斗指挥员的相继牺牲，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土匪的枪声，要我们投降的嗥叫声，加上吹哨和“冲呀、杀呀”的叫嚣声，此起彼伏，似乎真的就要向我们冲下来。我因为与所有的同志原都不认识，战斗虽已进行近两个小时，时间却是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所以无法互相了解，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文工团的女同志大声说：“我们就这样等死吗？你们男同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挥战斗！”一位同志指着我对大家说：“叫他出来指挥，他是个区长。”可能是我当时穿的是一套由北方带来的兰制服，持有一支手枪，同志们便把我看成为区长。附近的几位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支持那位同志的建议，要我出来指挥。他们说：“区长，你就出来指挥吧！我

们都听你的。”在这紧急的时刻，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同志们的信任和委托，感到义不容辞，便毅然承担起指挥这场战斗的职责。

我知道，战场上的迟疑不决和错误的决定，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土匪的猛烈射击与疯狂的叫嚣，使我没有与同志们商量的余地。我寻思一会，认为夺取制高点仍是摆脱当前被动局面的唯一出路。前两次的失利，主要原因是过早暴露我们的行动。我决定立即组织第三次突击，攻占制高点。我指定靠近我身边的四位持枪的同志为突击组成员（其中有两个是一三七团的干部，就是刚才接过排长和战斗组长枪弹的那两位同志；另外两位可能是文工团的男同志），并指定一三七团一个干部为组长。我特别嘱咐他们一定要利用地形、地物，逐个地隐蔽前进，出其不意进行突然袭击；我还提醒他们，前进时一定不要再走排长他们曾走过的路线。待他们行动后，我便开始检查剩下的人员和枪弹情况，但当时实在无法搞清人员伤亡和弹药的确切数字，我只知道枪支弹药已所剩无几了。这时制高点土匪阵地上还未见有任何异样行动，只见山顶上有人抱着小孩打着伞，悠闲地在观阵，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已丧失战斗力，因而才如此肆无忌惮。不一会，我看到一三七团的干部回来了，就急不可待地问：“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已接近制高点的山脚，因为未见那两个同志跟上，打了一梭子弹就只好回来了。”我问：“那两个同志那里去了？”这时，从另外一个地方传来了那两个同志答话的声音：“我们的枪不能射击，枪膛内卡有弹壳，又没有通条通出来，所以没有跟上去。”原来，他们拿的是文工团的道具用枪。

这次突击的再度失利，使我认识到突击制高点的行动不能再持续下去。大白天以少数人仰攻力量比我强的敌人阵地，本来就非常困难，加上土匪已知道我们的意图，加强了防备，如再坚持下去，不仅将会增加伤亡，还会挫伤士气。这时已近下午四时，有些山头上的匪徒逐渐向我们逼近，看来，不等我们坚持到夜幕降临或救援的到来，他们就要向我们发起冲击。土匪炽烈的火力和更甚的叫嚣，证实这种冲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同志们都在焦灼地等待着我拿出主意。我急如火燎，尽力寻思，我想到强行突围，想到攻占另一山头，想到坚守等待救援……这些想法都被我自己迅速否定了：我们的力量太弱，女同志、徒步人员和伤员又这么多，又是在大白天，我们已暴露无遗……这些不利因素，我都考虑过。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与后面那辆车的同志会合，增强力量，再相机夺取山头，就可能改变现在所处的不利境况。战斗发生到现在，已经两个多小时，后面那辆车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是的，向后车靠拢”，这一想法一下吸住了我，并在我的脑子里迅速形成一个具体行动方案。我立即把这一打算告诉在场的同志，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要求同志们每四个人为一个组，利用地形、地物，秘密地逐个地向后车靠拢；伤员和女同志先转移，我们持枪在后掩护。大家很快就行动起来，当最后一个小组开始后撤时，我看到汽车底下还有一个男同志，我催他起来随我后撤。他说：“我那里也不走了。”我问他哪个单位的，为什么不走？他只说在铜仁专署财政科工作，就再不理我了。我一再叫他随我走，甚至拖他、踢他，他还是不肯起来，我没有办法，只好随着大家转移。解围后，我见这位同志被土匪杀死在汽车底下。

这位同志可能参加工作不久，被当时激烈的战斗吓坏了。

当我转移到后面那辆车附近时，看到汽车横在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先我撤下来的同志已在车的右边山脚下掩蔽着等我。我看到在他们掩蔽地的半山腰有一片很茂密的山林，看情况未被土匪占领，就立即率领大家进入这片林地。从林隙中看到第一辆车周围正聚集着很多土匪，争相抢夺车上的东西。靠近这辆车的各山头上的土匪，正陆续向那里跑去。其实车上除了一些演戏用的道具、服装和一部电影机外，没有什么东西。我们立即集中火力向车上和车子周围的匪群猛射，不少匪徒应声倒地，但抢夺并未停止，向车子奔跑的土匪也未停止。这个时候，原后车上的同志纷纷从他们隐蔽地出来与我们会合，其中有省军区的徐科长。原来，他们的车刚进入土匪设伏圈的边沿，就遭伏击，他们在混战中跑到这片密林隐蔽起来。我来不及询问他们的情况，因为这时我看见我们原先所在山头上的土匪，正纷纷沿着山梁向前边那辆车跑去。我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战机，立即夺取这个山头。我纵身跳起，举枪向山顶跑去，一边跑一边高喊：“同志们，跟我来，攻占山头！”所有持枪的同志和部分徒手同志都跟了上来。出了林地，距山顶土匪的阵地还有一段开阔地，空荡荡的。当我们通过这段开阔地时，被对面山头和邻近山头的土匪看见了。他们一下子高喊起来：“解放军上山了，解放军上山了！打呀！打呀！”接着，子弹雨点似地朝我们打来。同志们奋不顾身，加快步伐向山顶攻击前进。忽然，我听到“唉”的一声，转头一看，我身边的一位同志倒下去了。我急步上前将他扶起，看到他的腹部已中三弹。他微微睁开眼睛，气息微弱地对我说：“区长，我不行了，我不能跟你攻占山头

了！”说着，艰难地卸下枪弹交给我，倒在我的怀中。我轻轻地将他就地放平，安慰着他，但他已停止呼吸，听不到我的话了。我含着泪告别烈士，便与同志们一道猛攻匪阵。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攻占这个山头，现在是最有利的时候，如稍有延误，战机可能一瞬即逝。因此，人人奋勇当先，个个勇往直前。这股锐不可当的英雄气概，把土匪压住了。大部分土匪因跑到前面车上抢东西，来不及回来，山上剩余的土匪惊慌万状，纷纷夺路逃跑。我们趁势占领了这座山头。

我决定用一切办法巩固已占领的山头，确保已经取得的主动权。这时，虽然有一部分土匪在对我们射击，并大叫大嚷，但大部分匪徒仍在抢夺前车上的东西。我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将持枪的同志集中起来，并将手榴弹分配给一些徒手同志，组成四个战斗组，分别防守山头的四方。把防守的重点放在南面和靠公路的东面，女同志和伤员就由徐科长率领安排在较安全的北端。在各战斗组都占领阵地后，我就到各组之间了解战斗准备情况，鼓舞大家的战斗意志。同志们斗志昂扬，信心十足。我要求他们必须沉着应战，注意节省弹药，非到土匪逼近我们火力最有效的距离内，不予还击；我还提醒他们：土匪有可能向我们发起攻击，必须作最坏的打算。

土匪看到车上已无东西可抢，我们又占据了这座山头，醒悟到自己失算了，便恼羞成怒地纷纷向我们阵地围拢过来，包围圈在逐渐缩小。猛烈的枪声、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此起彼伏，特别是南面和公路方面的匪徒更是猖狂。我们利用地形，居高临下，严阵以待，一枪未发。土匪摸不清我们的虚实，进逼一阵后，停下来向我们射击一阵，相持了一段时间，我们

看到公路附近匪阵中有点异样，随着就见到数十匪徒开始向我们阵地逼近。他们前进一小段又停下来向我们射击一阵，见我们仍无动静，又前进一段，再停下来射击一阵。一直等到他们已进入我们最有效的射程内，我们才突然射击。几个土匪倒了下去，其余的都惊慌地溃退。从此以后，土匪再也不敢向我们发起攻击，他们的枪声和叫嚣声也逐渐减弱。这些乌合之众，看来，对我们已不可能有更大的威胁了。

我来到阵地的北端，准备了解一下这个方向的匪情，与徐科长交换下一步的行动意见。当时，有几位同志向我提出：利用这个时机，立即组织向盐信方向突围。我认为这个时候突围，持枪者和男同志比较容易，女同志和伤员就有困难。一旦我们的突意图暴露，在突围途中被围击，匪众我寡，必然会遭受更大损失。于是，我决定天黑以后开始突围。我考虑到战斗发生到现在已近四个小时，援军可能到来。我的意见得到徐科长和在场同志的支持。我回到东面的阵地，一个同志突然向我提出：“区长，给我两个同志，我带去冲入匪阵，狠狠打击他们一下，活捉两个土匪回来！”他见我没有立即赞同，以为我不认识他，对他不信任，便激动地说：“我名叫张敬国，共产党员，铜仁军分区组织干事，请你相信我！”我说：“我们人枪都少，弹药也所剩无几，阵地这么宽，再分散兵力不合适。”不待我说完，他就端着枪向公路方向匪阵跑去，一边高声说道：“我一个人也要狠狠揍他们一下！”我连喊数声，要他回来，但他仍旧继续向匪阵冲去。只见他很好地利用地形、地物，直跃进到匪阵前沿尚未被土匪发觉。他猛地站起，大吼一声：“不准动！”便向匪徒急射一梭子弹，随即就地卧倒，继续射击。土匪晕头转向，纷纷向后逃跑。

他追几步，打一梭子弹又卧下，这样反复数次，土匪发觉只有他一个人，便都停下来，回头向他射击。有几个土匪从侧面向他迂回过来。我叫同志们用火力压住迂回的匪徒，掩护他安全撤回。

时近黄昏，土匪的气焰越见减弱。我考虑着入夜突围问题，计算援军可能到达的时间。战斗发生后，我们虽未向有关方面发出求援信号，但我相信，盘信或铜仁方面，总会知道我们被土匪围困的消息的。忽然，有一个同志说：“区长，你听，我好象听见什么声音来了！”接着，有几个同志也说：

“是的，我也听到了，好象是汽车的响声！”大家顿时喜形于色，静静地倾听着。与此同时，铜仁方向的匪阵中出现了骚动，骚动很快蔓延到所有的匪阵，随即见他们没命地往公路两侧山上奔跑起来。还听到从匪阵中传来“解放军的车来了”的惊呼声。汽车的响声，越来越清晰，我们知道援救我们的人到了，都不约而同站起来向铜仁方向公路上眺望。只见两辆汽车，开到我们第一辆车处停了下来。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迎着来车跑去。突然，从来车方向朝我们射来一排枪弹。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愕然。我叫大家就地卧倒，估计可能是未人把我们误认为土匪了，于是便大声与来人联系，很快地就联系上了。我们急跑到那里与他们会合。见面时，我们都热泪盈眶。当时的心情，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

会合后，我们惊愕不已：援军的人数，不足一个步兵班，两辆车上全装着食盐，原来他们并不是专程来援救我们的，二辆盐车中午由铜仁起运，准备到松桃交货。车到大兴后，听当地群众说：盘信方向的公路上有激烈的枪声，他们便停